

# 论西夏对凉州的经营

梁继红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 武威 733000)

**摘要:**河西走廊在西夏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作为河西走廊门户的凉州,更因其地理环境、交通、自然经济和历史等因素倍受西夏统治者青睐,从崛起、建立国家到灭亡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凉州的经营。凉州在西夏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西夏;凉州;经营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91(2006)02—0043—04

凉州是河西走廊东端的门户,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极其优越,特别是汉辟河西四郡以来,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愈显突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凉州“山川险扼,土地沃饶,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张轨以后,恒以一隅之地,争逐于群雄间”。五代宋初,党项族在西北崛起,这个以战争为生存方式的游牧民族也被凉州吸引。西夏统治建立后,凭借凉州有利的地理优势,富饶的经济资源,在同周边各民族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权,不断开疆拓土,积累财富,完成了对西部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与强大的宋、辽、金政权相抗衡的西夏国家政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凉州成为西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sup>[1]</sup>从 1032 年元昊夺取凉州到 1226 年蒙古攻占西凉府(西夏升凉州为西凉府),西夏控制凉州长达 190 多年,几与西夏历史相始终。本文试从凉州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入手,论述西夏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对凉州的经营,以及凉州在西夏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 一、西夏经营凉州的自然地理基础

河西走廊负山阻河,地理环境既特殊又优越,易守难攻,战略地位重要,在西北地区的历史发展及中央王朝对西北的经营过程中向来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凉州就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重镇。独特的地理环境,发达的交通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奠定了凉州在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地位。

历代凉州所辖范围不同。宋初凉州称西凉府。其辖区东达黄河以东的原州,南以祁连山、横山(今陕西省西北部山脉)为界,与兰州相邻,西至甘州,向北则深入大漠地区,范围非常广大。当时据有凉州的是六谷吐蕃部,他们和南部的河湟吐蕃、西部的甘州回鹘在当时都具有很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

凉州虽地处偏远,但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复杂,境内绿洲、平原、沙漠、高山、丘陵、戈壁断续分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部、南部祁连山区,崇山峻岭,地势高耸,海拔 2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30 余座,祁连山纵贯境西南,支脉天梯山、莲花山、第五山等山势高峻,林泉茂密。州境西南峡谷川原环绕,山脉或平行蜿蜒,或首尾相接,乌鞘岭高峻挺拔,四周群峰纠结,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岭西北又有古浪峡,最宽处约 250 米,最窄处约 20 米,古浪河从中穿过,水流湍急,峭壁千仞,峡中隘道便是连通凉州与兰州的咽喉通道,因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享有“金关银锁”之誉。

凉州在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汉武帝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自唐至宋,从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大致有五条,自北而南,依次是夏州道、灵州道、泾原道、熙兰道、青唐道。五条道路中,灵州道、泾原道、熙兰道都是以凉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交通网络。夏州道和青唐道虽不经凉州,但夏州道不仅要经过西夏占据的夏州,而且要北上穿越毛乌素、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道路险远,宋夏开战后,此路阻绝;青唐道则要穿越河湟吐蕃控制的青海境,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及海拔四五千米的许多高峰,艰险异常。

收稿日期:2006—01—13

作者简介:梁继红(1967—),女,甘肃武威人,甘肃省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副研究馆员。

因此，以凉州为中心的三大交通路线成为中国内地与西域、西亚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

凉州不仅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军事要塞，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和物资交流的重要驿站和商埠，商业贸易繁荣发达。东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sup>[12]</sup>。隋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的首领、使者、商人，朝谒于焉支山，炀帝令张掖、武威士民盛装欢庆，以壮声势，凉州的繁荣与富庶尽显于此次盛会。唐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城的繁华，描述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sup>[13]</sup>

凉州的北部和东部被腾格里沙漠包围，沙漠面积占凉州领土的三分之一以上，气候干旱少雨，风沙较多，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这样的环境使中部自然条件优越的绿洲平原更成为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

凉州中部是河西走廊东段最大的一片沃野绿洲，不仅是西部较好的生存场地，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屯田畜牧的重要场所。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美，日照充足，南部和西部紧靠祁连山，山上的积雪和冰川是绿洲天然的固体水库，发源于祁连山的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东大河、西营河等河流先后汇入石羊河，最后注入位于凉州北部的白亭海。六大河水流经的地方，水草茂盛，宜农宜牧，西凉府六谷首领潘罗支<sup>[14]</sup>（卷七 真宗本纪）就是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强大起来的，中原王朝戍守西陲的军队所需要的粮食从这里供应，唐将郭元振督凉州五年，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余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sup>[15]</sup>（卷九七 郭振元传），重要的军事物资尤其是战马也是从这里或者通过这里从西域取得。

独特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网络，使凉州在军事上占有地利优势。汉唐以来，凉州一直是封建王朝屏蔽中原，向西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清人吴广成在论及西夏统一河西之举时说：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sup>[16]</sup>（P130）

凉州的自然地理条件，使畜牧业和绿洲农业成为当地主要的经营方式，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sup>[17]</sup>。历代统治者经营凉州时都在此设立养马监牧养官马。西晋时凉州把大量马匹送入洛阳，后凉州骑兵远赴晋难，获“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美誉。《读史方輿纪要》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唐代，凉州养马业较为发达，凉州马极负盛名，仅官马数量就达三十万匹。对西夏少数民族来说，马是极为重要的军事资源，党项族历来重视对马的

驯养。党项马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唐代驰名中原的商品。中唐诗人元稹《估客乐》诗曰：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sup>[18]</sup>直到后唐，沿边榷场上入市中原的马匹，仍以党项马居多，只是此时入市中原的党项马已非西夏真正的良马，因为西夏早在李继迁时代就确立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sup>[19]</sup>（P79）的战略方针，开始了对凉州的争夺。此后几十年，李氏三代对河西“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sup>[19]</sup>（P130）。经无数次与吐蕃、回鹘的交锋，凉州几经易手，1032年，李元昊击败回鹘，才最后夺取凉州。

## 二、西夏对凉州的经营

西夏取得统治地位后，以凉州为重要的统治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经营措施，巩固了西夏的统治，促进了凉州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

首先，建立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陇右战场，从军事上明确奠定了凉州的重要战略地位。西夏党项族是在马背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主要以游牧狩猎为生，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经济落后，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主要是靠战争掠夺来获取，可以说，西夏政权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不战则无以为生。战争胜负的关键取决于地理环境、地形地貌、战争场所及其附近地区的物候、居民、经济等条件都是影响和制约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凉州则以其完备的条件，成为一个成就党项民族建立西夏政权的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

党项崛起后，北宋王朝采取了联合回鹘和吐蕃诸族牵制打击西夏的策略。回鹘和吐蕃诸族也因为受党项势力的胁迫，急欲和中原联手，削弱西夏。基于这种原因，凉州六谷吐蕃与甘州回鹘加强了与北宋的贡使往来。凉州成为他们联络各方势力，结成联盟的中心地区。从西夏方面来说，尽快摆脱河西诸部的掣肘，南下进攻中原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凉州成为各个政权争夺的焦点，谁先得到凉州，谁就能够得到整个河西走廊，得到对中西交通的控制权。

李继迁早就觊觎凉州，对往来北宋的吐蕃、回鹘使者抄掠不断，侵掠无虚日”。996年，李继迁进攻凉州，被占据凉州的吐蕃首领折逋喻龙钵击退。这是西夏首次进攻凉州，虽然未能得手，但西夏夺取凉州，建立河西战略基地的方针形成。此后，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西夏首领从未放松对凉州的进攻。1003年，1004年，1016年，西夏曾几度攻占凉州，到1032年，李元昊最后夺取凉州，河西走廊的瓜、沙、肃等州失去屏蔽。1036年秋七月，元昊攻回鹘，夺取瓜、沙、肃三州，全部占有河西走廊，元昊自凉州尽有其地，则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之忧矣<sup>[19]</sup>（P140）。西夏统一河西后，确立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昊的下一个目标便是“长驱南牧”，统一中原。他以凉州为军事据点，建立了控扼三边的河西陇右战场，展开了对中原北宋的大规模进攻。河西陇右战场的中心是凉州，元昊在虬六岭（今甘肃、青海两省界山）北侧，扼庄浪河谷，筑卓啰城，置卓啰河南军司。军司南距兰州 65 公里，东距会州 150 公里，三地呈品字形分布，形成犄角之势，拱卫兴州、灵州平原与河西走廊，阻隔青唐唃廝罗，与宋朝抗衡。凉州距卓啰和南军司 175 公里，是供应军需的可靠后方，从交通上说，从凉州出发东南行，翻过乌鞘岭可达兰州，沿古长城东行，过黄河则可到达会州，一旦兰、会不保，卓啰和南军司的重兵足以抗拒北宋军队；从地形地貌上说，凉州境内连绵高峻的山峰和无垠的沙漠，既是戍守的天然屏障，又是阻击包抄的有利战场，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地形优势，西夏又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军队。《宋史·兵志》记载了被称为“步跋子”和“铁鹞子”的西夏军队及其战斗力，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sup>[14]（卷一九《兵志四·乡兵一》）</sup>。

生存条件恶劣的沙漠环境，培养造就了党项民族剽悍矫健的特性。对长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传统农业区的封建王朝军队来说，要征讨西夏，无垠的沙漠、遥远的征途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却成了困扰他们的障碍。大军久驻则粮刍不继，纵兵深入则易为夏军所困。宋臣曾布在论及此事时说：朝廷出师常为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为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灵州。既无水草，又无人烟，未及见敌，我师已困矣。<sup>[15]（卷五）</sup>北宋军队在进攻西夏的战役中，多次被围困在沙漠中，丧师败军。

其次是将凉州作为辅郡，从政治上确立了凉州作为西夏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自汉辟河西四郡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曾在凉州置郡设县，管辖一方的军政事务。早在五凉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四个政权均建都于此，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及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西夏的政治中心非此莫属。在许多藏文史籍中记载，凉州是西夏王族的祖先生长和建功立业的地方。这虽然是个传说，但元昊祀神西凉府，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是相信这个传说的。更主要的是他认识到，对西夏来讲，凉州的战略防御功能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政治辐射力是其他地区不能比的。建立凉州政治中心，既有利于加强对灵夏的拱卫，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稳定和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

1032 年，元昊攻取凉州，不久即升其为西凉府，对

其进行正式的行政管辖。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同年十一月便“自诣西凉府祀神”<sup>[14]（卷四八五《夏国传》）</sup>。此后，西夏统治者开始对凉州进行系统管理，在政权机构上，设立了地位仅次于首都的西凉府，府下又设县、乡、社、卡等各级行政部门。

西夏建国后，在京畿地区设立中兴府（银川）、西平府（灵州），又在河西地区设西凉府、宣化府（兰州）和蕃和州（肃州）。西夏的官府分为上、次、中、下、末五品，河西的两府一州均属其府州的最高品级<sup>[16]（P362—363）</sup>。《元史·太祖本纪》载：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秋七月，蒙古进攻西凉，取西凉府搆罗、河罗等县<sup>[17]（P101）</sup>，从此记载可知，西夏西凉府下设县及其辖有搆罗、河罗二县的史实。

乡是西夏设立在农村的一级行政组织，1972 年武威张义乡小西沟岷出土的西夏时期的便条中有“依中各乡以属行遣”的记载，说明西凉府存在这一级组织。<sup>[18]（P299）</sup>社是西夏设立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目前尚未发现西凉府设立社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但河西其它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西夏在河西的行政设置与唐宋时期一样，有府（州）、县、乡、社各级行政机构。

卡是西夏交通要道上收税、检查的机构，张义乡小西沟岷出土的几件西夏时期汉文请假条记道：今申本卡先差司吏高践苟一名“，患伤寒，行履不能，本卡并无手力不”。<sup>[19]（P299）</sup>张义乡地处凉州与青海交界的山口，设立关卡，对凉州的军事和行政管辖都很有必要。1073 年，西夏又重修凉州城，加强凉州在军备上的防御能力。《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梁氏以中国城武胜，又复河州洮西地，恐兵从西蕃入，修凉州城及近旁诸寨为守计。<sup>[20]（卷二四四）</sup>

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又称《西夏碑》）载：大夏开基，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sup>[21]（P107—113）</sup>把凉州视为辅郡，说明它在西夏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西夏光定七年（1217）蒙古兵包围中兴府，西夏皇帝遵顼命太子居守都城，自己却逃到西凉府避难，遵顼的行为，也证明了凉州辅郡地位是属实的。

第三，将凉州建成西夏的粮食和军需供应基地，奠定了凉州在西夏不可动摇的经济地位。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族在迁徙以前，完全以畜牧和狩猎为生。《旧唐书》载其“不知稼穡，土无五谷”<sup>[22]（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sup>，直至唐贞观年间，迁到西北地区以后，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

建国前后，党项族占领了兴、灵平原和河西走廊的甘、凉等地，农业逐步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靠游牧、战争生存的党项族，在军事上很强悍，但生产力水平却很低。由于连年的征战，资源匮乏。占领河

西走廊后,西夏统治者对凉州、甘州农业区的农业生产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迁徙人口,增加劳动力,就是当时开发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连年的战争,凉州地区原有的人口或逃亡,或死于战火,劳动力损失严重。

西夏统治者为了增加劳力,除了役使戍边兵士和战争中俘获的生口用于耕种外,还迁徙大量人口到凉州地区从事农业生产。1972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两座西夏墓,从题记可知,两位刘姓墓主祖籍彭城(今徐州),应该都是徙居河西的汉人。<sup>[12]</sup>

兴修农田水利是西夏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举措。凉州境内的石羊河水系以祁连山冰雪融水为主要来源,水资源丰富。为了保证水利灌溉的顺利实施,西夏统治者又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水利法规和管理制度,并设立农田水利管理机构,管理水利灌溉的具体事宜。《西夏碑》碑铭中有“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靖,民庶乐安”的祈祷词,说明统治者对农业收成的好坏看得很重。元代初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达凉州《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凉州“出产小麦甚饶”,“地产野牛,身大如象……用以耕种,缘其力大,耕地倍于他畜也。”说明在凉州地区,农业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

西夏时期,凉州畜牧业也有显著发展。畜牧业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在“善水草,宜畜牧”的凉州地区,他们更是大显身手。宋皇祐二年(1050),辽征西夏,至凉州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万。<sup>[13]</sup>这一数字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 三、西夏经营凉州的历史意义

西夏对凉州的经营,在凉州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夏夺取凉州后,即以此为据点,统一了整个河西地区,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这里政权林立,战事繁多的局面,对后来蒙古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河西地区的统一,也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参考文献:

[1] 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正.西夏书事校证[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2] 范晔.后汉书·孔奋传 卷六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慧立,彦悛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 卷二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元稹.估客乐 A.全唐诗 卷四一八[M].扬州诗局本.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3.

[9]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

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凉州不仅发展成为西夏赖以支持战争和维持政权的军需、粮食供应基地,也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经营西北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据点。夏大安八年(1082),西夏“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准备大举侵宋。<sup>[4]</sup>《卷一四《神宗纪》》夏大安十一年(1085)秋七月,银夏州大旱,饥,“秉常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sup>[14]</sup>《卷三六》。

其次,凉州政治上的稳定及交通上的发达,进一步促进了凉州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西夏碑》碑铭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来自各地的商旅、使者,不仅给凉州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发达的工艺技术。1989年,武威古城乡塔儿湾西夏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瓷器,纹饰精美,种类繁多,烧造技术与宁夏灵武窑相差无几。1987年武威新华乡亥母洞寺遗址出土大量西夏文印本佛经,其中有一件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实物。<sup>[13]</sup>这一考古发现说明,在当时的凉州,印刷技术水平很先进,和中原差别不大,甚至有了泥活字印刷。<sup>[14]</sup>

第三,西夏对凉州的经营,进一步奠定了凉州作为西北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使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凉州成为西夏在河西的政治中心,便利的交通为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各民族人民在这里交流、融合并发展,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在这里交汇、发展。西夏统治者则采取开放的文化政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70年代以来,凉州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时期的古墓葬、窖藏、寺院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物,融汇了党项族、藏族、汉族、回鹘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化,可见,民族成分的多元性也成为凉州西夏文化的特点之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成分的大家庭,各民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文门第十章[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 宋濂等.元史·太祖本纪 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12] 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J].考古与文物,1980(3).

[13] 孙寿龄.武威亥母洞出土一批西夏文物[J].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增刊),2002.

[14] 孙寿龄.再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J].陇右文博,1999(1).

[责任编辑 方建春]